

中华诗词研究丛刊

(毛泽东诗词专辑)

中华诗词研究院 编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泽东词沁园春雪

沈鹏书

四

图

中华诗词研究丛刊

(毛泽东诗词专辑)

中华诗词研究院 编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诗词研究丛刊: 毛泽东诗词专辑/周兴俊主编; 中华诗词研究院编. --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068-3303-5

I. ①中… II. ①周… ②中… III. ①毛泽东诗词 IV. ①A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10270 号

编 者 / 中华诗词研究院

主 编 / 周兴俊

责任编辑 / 游 翔

责任印制 / 孙马飞 张智勇

封面设计 / 冀 宁 吕兆梁

出版发行 /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53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 sina. 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制 /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 12.5

印 数 / 0001—2000 册

字 数 / 219 千字

版 次 /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华诗词研究丛刊》编辑委员会

主 任：陈进玉 袁行霈

副主任：陈鹤良 周兴俊

委 员：陈进玉 袁行霈 陈鹤良 周兴俊

杨逸明 蔡世平 刘庆霖

《中华诗词研究丛刊》编辑部

主 编：周兴俊

副 主 编：刘庆霖

发稿编辑：莫真宝 杜姝文 刘香兰 殷 鑫

目 录

“毛泽东诗词与中国诗歌的发展道路”学术研讨会致词、总结	
摘编	(1)
毛泽东诗词与人格化的“大我”	李 捷(18)
——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境界和精神品格	
毛泽东诗词的革命性思维	陈 晋(26)
毛泽东诗词和中国现当代诗词的发展创新	郑伯农(33)
——在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上的讲话摘要	
毛泽东诗词的情趣和理趣	吴欢章(46)
光辉的历程 壮丽的史诗	李同义(53)
试论毛泽东诗词在诗词审美史上的地位	刘汉民(60)
试析毛泽东诗词的地理属性	王健虎(69)
毛泽东诗词的历史情怀	杨 义(80)
论毛泽东诗词的时空描写艺术	俞 良(100)
学习毛泽东诗词的时代精神	赵玉华(108)
论毛泽东诗词对中国诗歌民族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胡国强(115)
谈如何理解毛泽东的诗词	李中权(125)
毛泽东诗词是当代诗词创新的典范	陶文鹏(131)
流韵壮东风	李树喜(145)
——略论毛泽东诗词与当代诗词复兴	
“喜闻乐见”、“民族风格”、“中国气派”	朱向前(154)
——从毛泽东诗词看毛泽东的文化自信与自觉	
毛泽东诗词简论	周啸天(162)
——《毛泽东诗词鉴赏辞典》序	
毛泽东诗词:承前启后的不朽之作	易 行(169)
——在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上的发言	

附录

毛泽东致臧克家等	(177)
毛泽东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上的批注	(178)
毛泽东《词六首》引言	(183)
毛泽东对《毛主席诗词》中若干词句的解释	(184)
毛泽东致陈毅	(188)
后记	(190)

“毛泽东诗词与中国诗歌的发展道路” 学术研讨会致词、总结摘编

在2012年9月23日至25日召开的“毛泽东诗词与中国诗歌发展道路”学术研讨会上，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名誉会长逢先知致词说：

毛泽东在建国以后，很关注中国诗歌的发展道路问题。1957年他请袁水拍、臧克家到家里讨论新旧诗的区别时说：关于诗，有三条：精炼；有韵；一定的整齐，但不是绝对的整齐。要从民间的歌谣中去发展，过去每一个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要调查研究，要造成一种形式。毛泽东在这里说的“诗”，是指新诗，也就是他后来所说的“新体诗歌”。他指明这种新诗，要从民间歌谣中吸收形式，并符合他提出的三条要求和标准，创造出适应当今时代需要的诗歌形式。

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中国诗歌的出路问题。他说：“我看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方面都提倡学习，结果要产生一个新诗。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毛泽东这个讲话，提出了民歌、古典、新诗并举的中国诗歌的发展道路，并强调与期待在古典和民歌基础上发展新诗，同时阐发了新的诗体要具有民族形式，要运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毛泽东的这一论述，对于诗歌创作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一贯重视民歌，注意搜集民歌，提倡写民歌。早在1926年在广东农讲所，他曾发动学员到各地搜集民歌，认为民歌中有许多很好的东西。1933年在江西中央苏区搞农村调查时，曾有意地

搜集了一些民歌。1938年4月在延安“鲁艺”讲话时，深情地回忆了他的民歌搜集活动。就在成都会议上，他号召搜集民歌。他说：“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回去搜集一点民歌。各个阶层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于是，在1958年掀起了一个民歌运动。在这次民歌运动中，确实出了一些比较好的民歌，但是由于受到当时不正常的政治环境的影响，也出了不少从艺术形式到思想内容都不好的民歌。所以毛泽东看了郭沫若、周扬编辑的收入了“大跃进”民歌三百多首的《红旗歌谣》后说，“水分太多，就是选得不精。”他曾说过，还是旧的民歌好。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一直提倡和期待产生一种新体诗歌。他在1965年7月21日给陈毅的信中说：“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又说这种新体诗歌“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这里说的古典，不是指古典诗词，而是指典故，意思是说，新体诗歌绝不要用典故。他说，新诗与改革最难，最少也要50年的时间，才有可能有成型的新体诗歌。

毛泽东一生热爱古典诗词，重视古典诗词，从未否定过古典诗词。他曾说过，古典诗词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文化习惯和审美风尚。但是要发展，要改革。他又说：“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古典诗词创作在毛泽东的重视与肯定下，特别是在毛泽东诗词创作实践的激发、引导与促进下，几十年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毛泽东诗词，自从上世纪50年代正式发表以来，为古典诗词创作的改革作出了典范。关于毛泽东诗词对古典诗词创作的改革，谈几点个人的看法，就教于专家学者。

第一，对传统艺术推陈出新，谱写新的思想内容。毛泽东诗词对古典诗词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进行了改革，使革命的思想内容与传统的艺术形式达到完美的统一，成功地解决了旧形式同新内容的矛盾。毛泽东诗词对旧形式的革新，并不是完全抛弃传统的艺术形式，也不是完全突破传统的诗词格律。它对旧形式革新的本质在于，使古典诗词的面貌有所改变，在传统艺术形式的基础上推陈出新。

创造出了新的形象和新的意境，吟唱出了新的韵味。毛泽东诗词对古典诗词创作的改革，不只是在形式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内容方面。毛泽东诗词的内容是全新的，它表现了革命的思想，时代的精神。具体地说，毛泽东诗词反映了博大精深的毛泽东思想，它是毛泽东思想的艺术结晶；毛泽东诗词谱写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它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史诗；毛泽东诗词歌唱了时代的英雄业绩，它是时代精神的赞歌；毛泽东诗词展现了崇高的革命精神与豪迈的民族气魄，它蕴含巨大的精神力量；毛泽东诗词体现了毛泽东的美学理想，它具有丰富的美学内涵。

第二，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毛泽东曾说过，诗“应该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在中国诗史上，并不缺乏既是现实主义者又是浪漫主义者的诗人，也不少见既具现实主义又具浪漫主义的诗作。但是，像毛泽东这样自觉提倡诗词创作应该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统一，像毛泽东诗词这样达到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是罕见的。毛泽东诗词继承了古典诗词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精华，同时又加以发扬光大。毛泽东诗词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在我国文艺界早有定评。《蝶恋花·答李淑一》，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绝好的典范。郭沫若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一文中说：“这里使用着浪漫主义的极夸大的手法把现实主义的主题衬托得非常自然生动、深刻动人。这真可以说是古今的绝唱。”

第三，从民歌中吸引养料。毛泽东的诗词创作注重向民歌学习，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在语言、风格等方面，受到了民歌的影响。毛泽东诗词的语言，具有清新鲜活、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特点，表现了民歌的特色。他在1963年创作的《杂言诗·八连颂》，虽然是一首古体诗，但却具有民歌风格。

第四，少用典故，活用典故。毛泽东诗词少用典故，是因为他创作诗词讲求通俗易懂，典故用多了容易造成诗意的晦涩和阅读的障碍。毛泽东博览群书，知识渊博，但一点也没有“掉书袋”的习气。毛泽东在诗词创作中为了把现实生活表现得更有历史深度，更具诗情和寓意，也常常用一些典故。他用典故，具有化用、活用的鲜明特征。例如，《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借用李贺的诗句“天若有

情天亦老”，赋予完全不同的意义。又如，《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的“枯木朽株齐努力”诗句，将“枯木朽株”这一有贬意的成语反其意而用之，转变为褒意。即使一般读者不熟悉这一典故，也并不影响阅读。这种用典而不显典，正是作者构思的绝妙之处。

第五，谨守格律，而不拘守格律。毛泽东诗词在格律方面，一般是很严谨的，但绝不为其所束缚。有的评论者对毛泽东诗词的格律偶有突破而加以指责。有的把《蝶恋花·答李淑一》苛论为“大背格律”；有的把毛泽东的诗作如《五律·看山》、《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以不合格律为名打为“伪作”。对毛泽东诗词的格律，一些著名的诗人和学者，早有正确的评论。郭沫若在1958年写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一文中，论述毛泽东诗词时指出：“当然，也有些所谓专家，兢兢于平仄韵脚的吹求的，那真可以说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赵朴初在1964年写的《试论毛主席诗词艺术》一文中说：毛主席“在必要的时候他并不拘泥于格律，而且有意突破格律”。语言学家王力也在1977年出版的《诗词格律》一书中说：“毛主席的诗词，一方面表现出毛主席精于格律，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并不拘守格律。”

综上所述，毛泽东诗词的创作实践，为古典诗词创作的改革，为新体诗歌的发展，提供了范例。毛泽东诗词是当代诗歌的精品，它为古典诗词即旧体诗词在当代诗坛赢得了一席之地，希望新旧体诗歌在我国新的时代各放异彩。

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捷致开幕词说：

第一，毛泽东诗词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中华诗词艺术的集大成者。

毛泽东诗词的问世，开创了中华诗词发展的变革期。它很好地解决了五四运动所不能解决的继承传统与发展创新的辩证关系，既集中华诗词优秀传统之大成，又开创了一代新诗风。毛泽东诗词严守诗词格律，又自成风格，融继承与创新为一体。毛泽东诗词有所偏爱，又博采众长，汇百溪于一川。毛泽东诗词妙于用典，又朗朗上口，集典雅与通俗于一身。毛泽东诗词秉承“诗言志”的传统，

又赋予强烈的时代精神，实现了中华诗词从“小我境界”向“大我境界”的飞跃。

第二，毛泽东诗词创作作为中华诗词紧跟时代和历史发展步伐而实现其当代价值铺平了道路，创造了条件。

近代以来，中华诗词同中华文明一样，面临着时代发展的考验。这种旧的艺术形式，还能不能跟上时代脉搏，跟上历史发展进步的潮流，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获得新生。这是一个沉重的而又不能回避的课题。毛泽东诗词的问世，使中华诗词发展获得了新生。

毛泽东诗词紧扣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步伐，与人民、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奏响了一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凯歌，形成了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革命的史诗，彰显了中华诗词的现代性，在中华诗词发展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毛泽东诗词曾经达到家喻户晓、雅俗共赏的程度，推动了中华诗词的空前普及，也使世人对于中华诗词的当代价值刮目相看，彰显了中华诗词的群众性，为中华诗词在新时期的大发展铺平了道路。

第三，毛泽东文艺思想及毛泽东诗词创作实践为中华诗词发展指明了方向，积累了经验。毛泽东文艺思想，第一次把人民的主体地位贯彻于文艺创作理论之中。文学艺术的源泉来自人民实践，文学艺术的鉴赏主体是人民大众，文学艺术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同样也离不开人民大众，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文化建设的纲领也是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

正是秉承这样的宗旨，毛泽东诗词也把人民作为自己讴歌的对象。那些脍炙人口、诗意隽永的毛泽东诗词名句，无不把人民群众和人民时代作为赞颂的对象。例如：“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赞颂的是跟随中国共产党闹革命的工农群众的无穷力量。“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歌颂的是无产阶级站在社会发展潮头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先锋作用。“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感叹的是人民群众在旧社会的悲惨命运。而“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感慨的则是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的主力军作用。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便是《贺新郎·读史》。这首不朽诗篇，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群众观点

来重新审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以优美的艺术语言再现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此外，毛泽东还通过诗词创作实践，总结出中华诗词发展带有规律性的认识。例如：“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然其中亦有比、兴。”“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尽管他不提倡在青年人中间推广旧体诗词，但对旧体诗词的发展依然寄予厚望，提出许多富有启发的见解。这些，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中华诗词繁荣发展，具有极大的指导作用。

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从1994年12月成立至今，已有18年了。为了进一步推动毛泽东诗词研究事业，我们长期以来就有一个愿望，进一步加强同中华诗词学会的合作。这次年会，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也是我们两个学会今后发展的新起点。长期以来，我们还有一个夙愿，这就是创办研究会的学术性刊物。这个愿望，也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在本次年会召开之际实现了。一个同中华诗词学会的合作，一个创办自己的刊物，这两个美梦成真，预示着毛泽东诗词研究事业和中华诗词事业必将乘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东风，再铸新的辉煌！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致词说：

我想就“弘扬毛泽东诗词文化”问题，谈几点意见。

第一，弘扬毛泽东诗词文化，首先要深刻认识毛泽东诗词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本质关联，深刻认识毛泽东诗词在20世纪伟大历史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深刻认识毛泽东诗词在中华诗歌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没有这三点基本认识，就很难充满感情地、充满学术味道地去研究和宣传毛泽东诗词。谈到毛泽东诗词，有两个概念是使用最多的。一个概念叫作“史诗”，一个概念叫作“瑰宝”，称之为“民族史诗，艺术瑰宝”。所谓“民族史诗”，就是诗歌和历史的本质联系，毛泽东诗词从一个角度揭示了中国革命、建设历史的本质。所谓“艺术瑰宝”，就是它符合艺术规律，契合传统诗词的

基本要求，并且取得了推陈出新的大力发展。我们说，中华优秀诗词是文化瑰宝，毛泽东诗词是中华诗词中的瑰宝，一个“史诗”，一个“瑰宝”，这是我们弘扬毛泽东诗词文化的认识前提。

第二，弘扬毛泽东诗词文化，要和今天主动担当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责任更好地结合起来，要在我们今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整体格局中，明确毛泽东诗词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发挥毛泽东诗词的独特优势。刚才凌启鸿同志介绍了江苏省怎样开展诗教活动的一些经验，这无疑使我们认识到毛泽东诗词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第三，弘扬毛泽东诗词文化，需要自信自豪地深入研究和生动呈现毛泽东诗词特有的精、气、神。好诗都有精、气、神，我们叫作精神气象或者文化气象。我们要想方设法地把毛泽东诗词所蕴含的特有的精神气象挖掘、呈现出来，也就是要把毛泽东诗词的魅力挖掘出来、展示出来。诗歌的魅力，毛泽东诗词的魅力，恰恰在于常论常新，常读常新。不同的时代去读同一首诗词给人以不同的启发，不同年龄去读同一首诗词会给人以不同的启发，不同的境遇去读同一首诗词也会给人以不同的启发，这就是毛泽东诗词的魅力所在。与其他诗歌的精、气、神相比，我觉得毛泽东诗词的精、气、神正因为有“史诗”、“瑰宝”的特征，所以才会发挥出更大的社会作用。

第四，弘扬毛泽东诗词文化，更要自觉去探索、把握和运用文艺创作和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研究毛泽东诗词文化，本身就是研究文化。我们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就是“毛泽东诗词与中国诗歌的发展道路”，这本身就是深入研究文化创造和发展规律的话题。要把这个话题引向深入，就需要提倡恩格斯说的历史分析和美学分析的方法，并且把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这当中，涉及到从规律上去分析毛泽东诗词、毛泽东诗论与中国诗歌发展道路的关系。

总之，毛泽东诗词是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宝贵资源。我们知道，文化的影响，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最为深远的影响。世界上几乎所有资源都是有限的，甚至包括生命起源的水和空气，随着环境污染和气候恶化，也都是有限的，而唯有一种资源，却是永远不会枯竭的。这种资源就是文化。只要有继承和发展的自觉和自信，它往往会发扬光大，不断放大它的价值和作用。这正是

毛泽东诗词文化的魅力所在、中华传统诗词的魅力所在，也是我们今天弘扬毛泽东诗词文化的自觉和自信所在。

中华诗词学会会长郑欣森致词说：

毛泽东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诗人。综观他传世的诗歌作品，创作时间超过半个多世纪，不仅题材多样，多数作品为其革命生涯的艺术纪录，表现了广阔的胸襟、深远的境界和高尚的情操，而且纵横捭阖，气象磅礴，具有革命史诗的气魄。他对中国古典诗词格律运用自如，善于通过典故、神话和寓言以及赋、比、兴等手法，创造出新的诗意。这些都奠定了毛泽东在现当代中国文学史、诗歌史中的重要地位。毛泽东诗词自从公开发表以来，其所发挥的“诗教”作用，怎么估价都不过分。我们好几代人都深受毛泽东诗词的影响，毛泽东诗词的名句、境界、意趣，已成为我们重要的精神力量和滋养。特别是在那个传统文化受到不公正对待、旧体诗词几乎无存身之地的年代，毛泽东诗词的公开发表，意义尤为巨大，不仅彰显了旧体诗词的魅力和生命力，对于旧体诗词的保护、传播更起到了无可代替的作用。

关于中国诗歌的发展道路，诗歌界都很关心，许多人都在思考和探索，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我想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有关论述，是很有裨助的。他在致陈毅的一封信中说：“民歌中倒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民歌即民间歌曲，又称民谣，是民间音乐的一个门类；民歌的文学部分（即歌词）属民间文学。民歌以口头创作、口头流传，不断再创作的形式生存于民间。对于真正的民歌，群众的再创作是其发展的重要环节。从中国诗歌发展的历程来看，就与民歌有着分不开的关系。孔子整理《诗经》三百零五篇，属于民歌的“十五国风”就占了一百六十篇。屈原整理楚辞《九歌》，保留了不少南方楚国的民歌。汉代设乐府官署搜集民间音乐，使汉代的民歌得以保留。此后各个朝代都有人从事民歌的搜集与整理。唐代将民歌加工为曲子，五代北宋又将曲子再加工形成著名的词。1919年“五四”以后，北京大学成立了歌谣研究会，出版《歌谣周刊》，载有民歌（歌词），

从此民歌登上了大雅之堂。因此，毛泽东对民歌的推崇是符合实际的，中国传统诗歌的发展也一直离不开民歌的滋养。

毛泽东所期望的“新体诗歌”，能够吸引民歌中的“养料和形式”。这个养料，应该包括民歌丰富的内容、永无歇止的创造力、不同特色的风格等。民歌的形式，除七言体外，还有三、四、五、六、八言的，或多达十几字一句，章、段、句结构也多有不同。此外，民歌中多有运用比兴、夸张、重叠、谐音等手法，毛泽东一再强调诗要有“形象思维”，在民歌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这些无疑都是“新体诗歌”所需要的。

这个“新体诗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现在还很难说；能否最后形成，也还未知。但从毛泽东的论述看，有三点需要注意：一是需要创作界和理论界的积极参与。毛泽东说要“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那么靠谁来吸引呢？当然是写诗的人，研究诗的人，不仅要有自觉的追求，还应有一些规划等，以便共同努力，有所突破，有所成就。二是“新体诗歌”不应只是一个格式、一种样式，应如毛泽东所说是“一套”，即在基本的要求之下，有着可供选择的多种创作样式。三是这需要有一个过程，如毛泽东所说是“将来趋势”，是“很可能”的，急不得，要符合诗歌生成的规律。但要有信心。以上是我学习毛泽东关于“新体诗歌”的一点体会。

目前中国诗坛有新旧两家，即旧体诗词（传统诗词）与新诗（白话诗）。

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国古代诗歌经历了数千年漫长而不间断的发展。“五四”时期虽然受到打击，后来又被挤出了文学史，但仍然不绝如缕，仍然有着数量可观的作者队伍。特别是近30年来，随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识的回归，中华诗词也逐渐复苏，并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毛泽东当年曾说，旧体诗“不宜在青年中提倡”。现在，大学生的旧体诗社甚多，前几年中华诗词学会接收了河北沧州的一名中学生入会，当时才12岁，诗词格律熟练，诗写得很不错。如果毛泽东健在，相信他也会感到高兴。中华诗词的顽强生命力，在于它与我们古老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相联系，在于它是传统文化中最受关注和喜爱的一个部分，在于它与汉字这一极富形式感与表达力的文字的特点有关，除非我们彻底摒弃传统，除非我们完全

废除汉字，否则，旧体诗词仍然有其存在、发展的土壤与条件。

作为旧体诗词，本身也是发展的。例如，中国古代诗歌的代表形式是律诗，其形成则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诗经》、《楚辞》等已具备了一定的韵式，从《古诗十九首》至建安诗人创作已略具五言八句诗歌雏形，但真正从古风向律诗转化的关键是南朝齐梁新体诗，到唐朝则成熟定型。律诗就要守“律”，毛泽东说：“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他本人的律诗严守平仄，但在用韵上却突破了传统的“诗韵”，例如《七律·答友人》（九嶷山上白云飞）四支、五微通押，《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十四寒、十五删通押，《七律·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与《七律·和柳亚子先生》（饮茶粤海未能忘）都是三江、七阳通押，也就是说，把诗韵放宽到了词韵。而如《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一句一韵，十句十韵，均押去声韵，分属十四愿、十五翰、廿八勘。按照词韵，十四愿（半）、十五翰可通押，廿八勘只能与廿九艳、三十陷通押，显然，这首词的用韵又突破了传统的“词韵”。但用今韵读来，却是押韵的。近年来，马凯同志提出“求正容变”，即既提倡坚持格律，又支持改革创新，这也反映了中华诗词发展的趋势，适应了时代的变化和要求。

中国新诗即白话诗也有近百年的历史，虽然“迄无成功”，但其成就还是相当可观的，影响仍然很大，一直占据着现当代诗坛的主流地位。因此，中国诗歌的发展，是否可以走旧体诗词（传统诗词）、白话诗（新诗）以及将来可能产生的“新体诗歌”的鼎足而三、共同发展的道路呢？我以为是可以的。从中国诗歌发展历程看，新体的产生，并不影响原有体式的继续发展，有了律诗，古风仍然为诗人所重，真正的名家，譬如杜甫，都有大量的古风，“三吏”、“三别”就是古风。毛泽东说：“李白只有很少几首律诗，李贺除有很少几首五言律诗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毛泽东有律绝，又有五古、七古、六言、杂言等。有了词，传统诗歌照样发展；有了白话诗，传统诗歌仍然存在；同样，将来有了“新体诗歌”，传统诗词也会继续有新的成就。诗坛应是多元并存、百花齐放的，应是互相借鉴、共同发展的。

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大学教授董学文总结说：

1. 从内容和形式方面来看。

毛泽东诗词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旧体诗词能否有所突破、“新体诗歌”能否得以确立，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诗词思想内容和精神境界的变化与革新，在于新的时代内涵同旧的艺术形式之间如何实现协调一致。用有的论者的话说，就是要努力完成“中国古典诗词表现当代生活的现代转型”。毛泽东诗词所以给人以巨大震撼，给人以审美享受，给人以强烈气场，给人以境界飞升，根本还是它那吞吐宇宙般的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气概，它那带着阶级体温与民族脉动的传奇般的史诗品格，它那改天换地的共产主义者的豪迈情怀和伟岸襟抱。毛泽东诗词虽是旧体，但它把美景、深情、大事、哲理融为一体，其内容使诗情、诗思、诗意、诗味都达到了新时代才有的高度，让人看到的是现代中国的活的姿影，体悟的是中华民族千锤百炼不朽的精魂。这种意境和情境的变革，恐是最为紧要、最为根本的。毋庸讳言，毛泽东诗词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甚至他的诗评也不忘政治的视角，如指认屈原的“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①。但这种政治性在他的诗词中却通过与高超的审美性和艺术性结合而生发出来的。从价值系统看，毛泽东诗词实践了他的主张，即“无论何种艺术，包括诗歌在内，适合大众的需要才是好的”。^②这正是毛泽东诗词在诸多现代古典诗词创作中独领风骚的第一位的原因，同时也昭示了古典诗词这种艺术形式若想在当今重获重生的一个极重要的条件。记得我会顾问、诗人刘征说得妙：“旧体诗要在当代振起（注意，他没‘振兴’一词——引者注），在当代文学史上居一席之地并放出异彩，必须能唱出时代的诗化的乐音，必须具有时代的美学特色，否则，以古人之笔墨写古人之情怀，写得再好也不过是仿制的‘唐三彩’，怕是终于难以立足的。”^③这对诗歌出路问题说得是很到位的。

① 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1页。

② 钟敬之、金紫光：《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04页。

③ 刘征：《“情动绳墨外，笔端起波澜”》，见《诗刊》1994年第2期。